

中华因缘与在地演化:长崎划龙船习俗的历史考辨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孙 凯

[摘 要] 以日本长崎划龙船习俗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其历史源流、文化内涵与嬗变过程。长崎划龙船习俗根植于中国端午节庆体系,尤其与福建地区的龙舟竞渡传统及水神信仰渊源深厚,于江户时期随闽籍海商传入长崎。在德川幕府“锁国”体制所形塑的特殊场域中,划龙船习俗经历了深刻的适应性转化,由最初的华人节庆逐步演变为当地社会的民俗实践,并融入神道仪式和现代体育赛事。长崎划龙船习俗,所呈现的“特定地域文化→特殊政治场域→功能适应性转化”的模式,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普遍性意义。

[关键词] 长崎 划龙船 端午 中日交流

引 言

划龙船(「ペーロン」)^[1]是盛行于日本九州西南部的竞渡船活动,尤以长崎一地最为兴盛,于每年公历6月15日前后举行。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黑岩义嗣(1940)就撰有《划龙船考》一书,对长崎传统的竞渡船进行了各方面的详细考察,认为其属于东亚乃至东南亚竞渡船的一种,并且明确指出划龙船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风俗。迄今为止,日本学界关于长崎及九州竞渡船习俗的研究已有深厚的积累。例如,濑户口照夫(1981)通过长崎与冲绳的跨区域比较研究,深入探讨了日本竞渡船的历史起源与文化内涵;熊野晃三(2004)聚焦于近现代长崎港划龙船赛事的形态演变与社会功能;榊原浩晃(2012)则系统梳理了江户时期以降竞渡船在长崎本土化的历史脉络。

既有研究虽成果斐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将其置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宏观框架下,特别是聚焦福建与长崎两地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深入剖析划龙船所承载的双边社会文化关联及其嬗变机制的研究,仍尚显不足。尤须加以关注的是,在江户幕府“锁国”体制所形塑的有限开放场域中,源自中国的竞渡习俗如何突破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边界,完成从“外来习俗”到“地方传统”的功能性与结构性转化?为回应这一问题,本文将以前近发掘的史料为基础,通过中日文献互证,重点探讨以下层面:江户时期长崎划龙船的传播形态、其与福建地区的文化渊源,以及其如何逐步嵌入地方社群生活。旨在通过这一具体案例,揭示跨文化习俗在受限语境中的适应机制与重构逻辑,为东亚文明交流史提供一份微观实证。

[收稿日期]2025-10-03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5年度福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与黄檗文化交融互动研究”(批准号:2025FZB024)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信息]孙凯,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民间信仰、中日交流史,电子邮箱:sk179502186@163.com

1 长崎划龙船习俗的历史嚆矢

长崎划龙船作为其独特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绝非孤立的地方性发明,而是东亚文化交流与在地化进程的深刻产物。其生成与发展根植于双重历史脉络的互动与交织:一方面,划龙船习俗承袭了中国古老的端午文化体系,历经长期传播与本土调适,逐步融入日本的岁时节令框架;另一方面,长崎在日本“锁国”体制下作为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窗口,构成了中日文化碰撞、融合的关键性跨界场域。正是在这一兼具地理特殊性与政治约束性的环境中,由中国传来的竞渡传统得以超越制度限制与文化边界,成功嵌入长崎的地方习俗与社会结构。

1.1 端午习俗的东传演变

端午文化源于我国古代夏至节气和阴阳五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禳灾纳福、驱邪避凶等民间习俗,后来又叠加了纪念屈原、龙舟竞技等文化内容和表演仪式,逐渐成为水神信仰、龙图腾崇拜、农耕祭礼、祛毒禳灾以及纪念先贤等多功能复合的文化载体(邢雪艳,2023)。《日本书纪》中见推古、天智两朝日本国君五月五日时采药于野之事(舍人亲王,2019:308、393、394)。古代天皇的出行狩猎,含有宣示自己对领域占有和支配的意义,但“五月五日”的药猎与一般的天皇出行狩猎有明显区别,其目的为采集药草和猎取鹿茸,这与中国端午采蓄草药的节俗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众所周知,推古朝时,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开始派遣“遣隋使”学习中国大陆的制度文化。其后,天智天皇推行“大化改新”,更是大规模移植中国典章制度与思想文化。日本的节日大多形成于日本的天武、持统年间,而只有端午节自推古朝开始,并有明确五月五日的记载,因此可以推断是受到中国大陆端午文化的影响(大日方克己,1996:68)。

关于日本早期竞渡活动的开展情况,史料中可见若干记载。例如成书于奈良时代的日本诗歌总集《万叶集》即有载:“宫人频来往,竞渡或并舸。朝并此川渡,夕竞渡此河”(赵乐甦,2009:15)。源高明著《西宫记》卷二十“临时八宴游”中记述:“天德五年(961年)正月十九日,于冷泉院,竞渡负态,公卿候献物,有酒饌弦歌鹈船,给禄”(源高明,1932:520)。《日本纪略》亦载应和元年(961年)“五月六日戊辰,天皇御钓殿,令侍臣竞渡”(日本纪略,1897:885、887)。这些史料清晰地勾勒出,日本早期的竞渡活动作为一种自中国传入的文化形式,其主要参与者为皇室成员及公卿贵族,活动带有浓厚的宫廷娱乐性质,但尚未普及至民间社会。及至江户时期,伴随中华文化在日本的深度传播与本土化转型,竞渡活动呈现出显著的庶民化与世俗化趋势,其重要表征是与端午节的紧密结合。据《古事类苑》记载:“竞渡者,村上天皇朝已盛于宫廷。后传崎阳,每岁五月五日行之”(神宫司序,1927:287)。可以说,自古以来端午节在日本的盛行,为竞渡文化在长崎地区的扎根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日本地方文献《长崎岁时记》述曰:

五月朔日,诸役人各诣奉行所拜贺佳节。值端午之备,市井间阖,家家檐际皆以菅蒲杂缀为饰,谓之“切幡”。或悬木棉幡一二幅,或张布幡,其上必染家纹,其下则绘云龙、灵龟诸宝,亦有鸣户纹样者。富室多按男丁之数,每人立一对。幡下陈设胄立、鸟毛、长枪、薙刀、青龙刀等造物。豪族好事者,更制纸幡五百千枚,画源平武士及钟馗、关羽类猛将形象,立于彩幡之侧。至若贫窳下户,力不能办布帛,则树纸幡二三十枚。(笔者译,下同)

(野口文龍,1971:783)

这段描述不仅展现了长崎端午节浓郁的本土化传统色彩,如“切幡”以及悬挂家纹、陈设武士造物等习俗,同时也揭示了其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元素,例如幡上绘制的云龙、灵龟以及钟馗、关羽等形象。这种民俗

形态的多元构成,生动体现了江户时期长崎作为对外交流窗口所承载的文化交融特性,亦为竞渡活动在该地域的民俗化、庶民化发展提供了直观的语境支撑。

1.2 江户时期的竞渡形态

历史上,在日华人举行龙舟竞渡之嚆矢并非始于长崎港,而是松浦氏大名所领的平户藩(今属长崎县平户市)。自1542年中国东南沿海巨商王直受松浦隆信之邀入驻平户以来,中日两国海上私人贸易随之勃然兴起,并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华人聚居区——“唐人町”,平户更是一度成为明末清初时期在日华人重要的贸易据点。而当时平户华人的生活实态,又多见于欧美商人的记载。平户英国商馆馆长查理·考克斯在任内写下的公务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其在平户经营贸易的状况以及一系列生活日常,其中对平户华人的社会情状涉及颇多,1617年5月28日就载有当地华人与日本人于五月端午期间举行龙舟竞渡一事:

今日,中国人举行划船赌赛。先于海中竖立一标杆,乘坐单侧配有八把乃至九把划桨的小舟驶出,以最先到达标杆者为胜,这样的竞渡活动连续进行两回。由中国人率先开始举行,其次则是日本人。此仪式自今年五月一日起,至五日止。对于中国人与日本人来说,这显然是最有意思的日子。并且在今日上午时分,人们纷纷以绿色的菖蒲搭配各种草类装饰房屋。

(爱德华·莫德·汤普森,2018:322-323)

由此可证,至迟于江户初期,在日华人在平户港于端午之际举行划龙船活动似已成惯例习俗,并对日本当地社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文化影响。1635年德川幕府实施“锁国令”,强制将唐船贸易限定于长崎港的政策变迁,又客观上促成长崎港成为划龙船的核心传承场域。这直接反映在江户中后期长崎地方文献中密集出现的相关记载,诸如《长崎岁时记》(1797年刊)(野口文龍,1971:782-783)、《长崎闻见录》(1800年刊)(廣川獬,1800)、《长崎古今集览名胜图绘》(1811年刊)(越中哲也,1976:248-250)、《甲子夜话》(1821年刊)(松浦静山,1910:89-91)等诸多长崎地方史志、文人随笔中均见有竞渡船的相关记载,而以上史料中一般将其称之为「ハイロン」。通过翻检日本现存之历史文献,目前可觅见关于长崎港举行划龙船的最早记录为田边茂启所撰《长崎志》(1760)中关于1655年长崎唐人举行竞渡船活动的记载:

自去冬起迄今春止,唐船数艘滞港未发。唐人遂作船祭之仪,乘舢板以为竞渡之事。尔后市中之人见而仿习之,每岁呼作「バイロン」。列轻舟数艘,奋楫争先,较迟速而定胜负,竟成船祭之典。

(田邊茂啓,1928:505)

以上史料表明,源自中国海商群体的竞渡仪式,经由当地民众的效仿学习,演变为具有长崎本土特色的岁时民俗,且保留了原有浓厚的宗教信仰色彩。据京都医师广川獬的《长崎闻见录》记载:

划龙者,崎阳之俗也,谓之「パイロン」,乃五月五、六日竞渡之戏。“龙”者,谓船首饰龙头;“划”者,持楫拨水也,状如镰刈草。此风本出唐土,原为吊屈原之遗事,五月五日竞渡海上,崎人见而效焉。长崎襟海而立,分三十六町,每町皆造轻捷之舟。一船可载三四十人,立町旗于其上,钟鼓喧阗,号子相和,众桨齐发。其行也,疾如百足,迅若飞矢。竞渡之后,各随庖船一艘,胜负未判之际,备酒饌以待。又有观者之舟,云集雾合,携歌姬管弦,以为游宴之乐。

(廣川獬,1800:8)

广川氏的记述表明了长崎划龙船习俗与中国端午节庆之间的文化渊源,同时揭示了其在江户时期长崎

港的高度盛行,已成为跨越社会阶层的全民性活动。《长崎岁时记》亦载曰:“市中贵贱、各浦老少人等,尽皆结群,浮船观览。更有各町各浦亲属知交之辈前来声援,相赠竞渡船以酒樽等事”(野口文龍,1971:783)。该记载不仅反映了龙舟竞渡的广泛社会参与度,更展现了其作为公共节庆所具备的社交功能与地方共同体意识。江户时期女俳人田上菊舍在其诗集《手折菊》(1812)中作有《崎阳五日观竞渡》曰:“曾闻此地楚风存,五日龙船厌海门。竞渡争来豪兴遍,千年屈子恨何论”(勝峰晋風,1922:361)。此诗不仅佐证了长崎龙舟竞渡的盛况,更通过“楚风”意象强调了其与中国端午文化的关联性,同时暗示了竞渡活动所蕴含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象征。然而,正因其激烈的竞争性与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该活动亦曾因引发群体冲突而遭到幕府禁令。

1800年长崎五岛町与肥前领深堀双方的日本年轻人,在争夺爬龙船胜负时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出现了人员伤亡,此次事件共有五十五人被判入牢狱。以致长崎奉行所翌年即颁布禁令曰:“关于竞渡船之事,往岁虽已严令禁止,然每年重申禁令犹未止歇,各处仍竞相举办。去岁五月,本五岛町民众竟私相结盟,于外海行竞渡之戏,乃至与肥前领深堀民众发生齟齬,其间竟致人命伤亡,殊属不逞之至。自今以后,若有藐视禁令、擅行举办者,当即擒拿严惩。嗣后各町须严加管束,倘有暗中筹办者,亟应举报告官。若隐匿不报而由他处举发,则不仅町长役人难辞其咎,阖町皆属失察,各宜凛遵毋违”(長崎市役所,1925:295)。松浦静山《甲子夜话》如是记载道:“此事距今廿五六载前,岁岁皆有所闻,其间纷争屡起。尝有年度竞渡酿成大衅,以致死伤。自彼时崎尹遂颁严令,迄今此风遂绝。年未及冠者,皆不复睹当年盛况,今唯作往昔轶闻耳”(松浦静山,1910:90)。揆诸史料可知,长崎奉行由于崎民争夺赛船胜负引发群体事件而曾一度禁止了爬龙活动,而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至迟到江户时代中期,划龙船已从在日唐人的端午传统活动变成了长崎渔村民众的惯例习俗。正如黑岩义嗣所指出:“自明历年间(1655-1657)以降,以日式船只进行的划龙船在长崎地区蔚然成风,并迅速向周边近海区域扩展,其传播范围大致涵盖了天草北部富冈至八代海水俣一带。中国传入的竞渡船习俗之所以能被长崎及其近郊地区广泛接纳和融合,主要归因于彼时作为日本唯一对外贸易港口的长崎商业的繁荣以及当地渔民自古以来便有的和船竞渡传统”(黒岩義嗣,1940:421)。

2 长崎划龙船习俗的文化渊源

承前所述,划龙船习俗的形成深受江户时代长崎作为中日交流枢纽的地缘特性影响,其中,尤以福建海商群体所携原乡风俗的直接塑造为甚。与此同时,长崎本土深厚的水神信仰体系,为这一习俗提供了文化接受的信仰基础与意义重构的仪式空间,并在功能上实现了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双重整合。

2.1 福建风俗的深刻影响

关于长崎龙舟竞渡的称谓,日方历史文献中存在「ハイロン」「バイロン」或「パイロン」等多种音译变体,以及如「划龍」「飛竜」「白竜」「競渡船」等汉字表记形式。「ハイロン」的称谓最早见于《唐通事会所日录》中“正德四年(1714)四月十一日”的记载:“盖因遣怀解郁,抑或值唐土五月五日之祭仪,谓之「はいろん」者,乃驾小舟而出焉”(東京大学史料编纂所,1968:77)。此条史料表明,「ハイロン」的表述通行于当时的唐通事群体之中,用以指称源自中国的端午竞渡习俗。值得注意的是,「ハイロン」与如今长崎通用的「ペーロン」之间存在明显的音韵差异。

对此现象,长崎著名乡土学者古贺十二郎提出了一个关键见解:后世长崎地方文献中出现的各种龙舟竞渡称谓,其源头恐皆可追溯至唐通事所用的「ハイロン」记音,时人可能误将这一特定群体内部的术语视为标准称谓加以沿袭。然而,「ハイロン」这一称谓是否曾广泛流通于江户时期的长崎民间社会,目前尚缺乏确凿证据,其实际使用范围存在疑问。究其本源,这种音韵分歧深刻反映了当时长崎语言环境的复杂性。

赴日唐人主要来自福州、漳州、泉州、广东、南京等方言区,长崎所通行的汉语实为混杂的多种方言变体,缺乏统一的官话标准音体系。因此,不同地域来源的侨民对龙舟竞渡的方言发音必然存在差异。这种语言输入的多元性,直接导致了「ハイロン」「ペーロン」等不同音译形式的并存,并在传播过程中未能实现标准化统合(長崎市役所,1925:279-281)。诚然,古贺十二郎的观点为理解长崎龙舟竞渡称谓的演变提供了一条基于文献谱系的可能解释路径。然而,其论述未能充分回应《长崎名胜图绘》中的关键性记载,该史料为追溯长崎竞渡习俗的源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语言学线索:

划龙者,划龙船也。划通作“划”,划即“櫂”,以櫂划水之谓也。划唐音读若「ワア」,龙音「ロン」,船音「ジェ」。旧本应称「ワアロン」或「ワアロンジェン」,然崎港土音讹唐音为「バイロン」,相沿成俗久矣。

(長崎史談会,1931:485、4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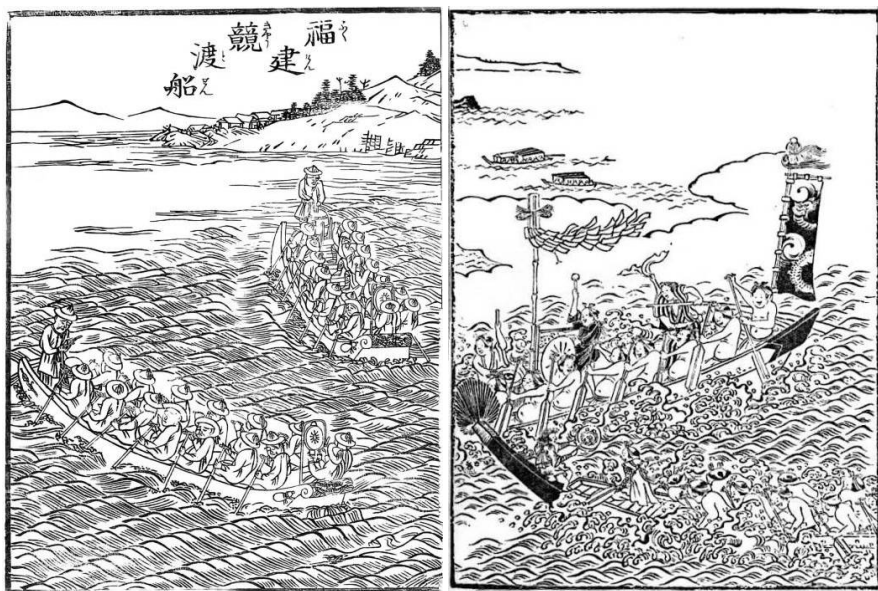
此段记载明确指出,长崎竞渡船旧称为“划龙船”,其日语假名所记录的发音「ワアロン」或「ワアロンジェン」,此发音高度吻合闽南语“划龙船(ua⁴liŋ²tsun²)”的语音特征。这一语源对应关系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印证,前述1655年在崎唐人首次进行划龙船活动之际,正是以闽南人为主的郑氏海商集团垄断长崎唐船贸易的鼎盛时期(孙凯、刘云,2026:65)。因此,长崎划龙船习俗及其名称主要源自闽南地区之推论应是符合历史逻辑的。由此可进一步推断,「ペーロン」的称谓可能亦源自闽南语“爬龙船(pe²liŋ²tsun²)”的假名记音。在民间节俗的实际操演中,口语称谓的选择显然更容易受到主流群体的影响,故而「ペーロン」一词逐渐在语言竞争中胜出,演变为长崎本地约定俗成的标准称谓。与之相对,源自唐通事权威记录的「ハイロン」等其他形式则渐趋式微,或仅存于特定历史文献之中。此称谓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划龙船”在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文化转译过程中发生的音韵适应现象,鲜明地揭示了民俗事项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所呈现的在地化特征。古贺十二郎在其论述的总结部分亦承认:“划龙船实由华南来航唐人传入,此证昭然,纵中国东北存龙舟竞渡之俗,然华南竞渡船与长崎地区之形制高度契合……福建地域之竞渡船技,确于长崎焕发异彩,终成独具特色的划龙船文化”(長崎市役所,1925:281-282)。

诚然,仅凭“划龙船”称谓的语音流变便断言其与福建地区的源流关系,论证维度略显单一。然而,多重史料证据链共同指向长崎划龙船习俗深受福建风俗影响。尤为关键的直接证据,见于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清俗纪闻》(1799)。该书由长崎奉行中川忠英主持,经唐通事直接问询长崎清商汇编而成,系统记录了清代乾隆时期福建、江浙等地风俗。该书对“五月竞渡”习俗的详尽记述,明确指向福建:

在福建地方,则造出长五六间,宽一间余之船只竞渡,但除龙头外,无其它旗帜等装饰。敲锣打鼓,由数十人乘船竞渡。此项活动既无需官府许可,亦无人禁止,因是多人聚集之事,只采取防止发生争论之措施。虽不知始于何代,但据传是凭吊屈原之古老遗俗。福建竞渡船,船身褐色。右船击鼓者淡褐色衣,左船击鼓者绿衣粉裤。两船划者衣蓝、绿、黄、红、紫色。皆带黄帽,帽缨红色。

(中川忠英,2006:36-37)

如《清俗纪闻》与《长崎名胜图绘》所附船形图绘清晰显示(见图1),长崎地区所用之龙船在船身比例、仅饰船头、船设铜锣等核心形制特征上与福建竞渡船基本相似,其物质形态的趋同性,为源流关系提供了直观且可靠的物证。明清时期划龙船在闽地十分盛行,福建地方志中多有记载,例如谢肇淛《五杂俎》载:“至于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谢肇淛,2021:41)。《崇祯海澄县志》曰:“所在竞渡,非惟吊屈,亦以辟邪。无贵贱咸买舟出游中流,箫鼓歌舞凌波,游人置竿船头,挂以锦绮。即《梦华录》所谓标竿竞渡,捷者夺标而逝,狂呼逼人焉”(梁兆阳,2019:137)。



资料来源:中川忠英《清俗紀聞》(中華書局,2006)長崎史談会『長崎名勝圖繪』(長崎史談会,1931)。

图1 《清俗纪闻》所载“福建竞渡船”与《长崎名胜图绘》所载“长崎划龙船”

更为直接的跨文化见证见于十八世纪中叶的漂流民记录,1750年日本奥州盛冈藩白滨村船主又五郎等八人漂流至福建省。翌年一行人随赴长崎贸易的福建商船归国,并于长崎奉行所接受询问,供述书详细记载了端午时节闽地的龙舟竞渡习俗。其中,福建船主童天荣、黄福二人对划龙船的描述尤为关键:

所谓“水战”(船军)者,划龙之戏也。其制列舟五十许,舟载二十人。舳舻饰龙首尾,竖五色幡旌。舟人服织金锦衣,鸣钲擂鼓,各执桨楫争进,其戏名曰“竞渡”。更有趣者,观者舟中裂活鳊之首,渍盐投流。伤鳊惊窜,竞渡之船各争擒之。盖行此戏可禳疫疠,故岁岁必举。厦门至闽地皆同此俗,长崎竞渡之制,实传自唐土也。

(宝曆元年唐国福建省江致漂着候奥州南部之者六人口書,1751:19)

童、黄二人作为谙熟福建本土风俗的闽籍商人,其证言自然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他们明确断言“此长崎竞渡之制,实传自唐土也”,“厦门至闽地皆同此俗”之言其实也是一种对长崎划龙船习俗福建源流的直接且具地域指向性的指认。究其根本,福建商帮在江户时代长崎华侨社会中占据长期主体地位,并始终活跃在唐船贸易中,此等社会结构与经济优势为福建地方文化的强势传播提供了基础。日本学界如二阶堂善弘、松浦章等学者亦普遍认为,长崎华侨诸多民俗与宗教祭祀传统与福建地区渊源颇深,划龙船习俗当属此列(二阶堂善弘,2009:99-108;松浦章,2009:109)。

此外,须加注意的是,如第一节中所述端午龙舟竞渡习俗蕴含深厚的宗教仪式性,其与闽南地区盛行的水仙尊王信仰的关联尤为紧密。例如,《厦门志》载:“水仙宫,在望高石下,明建。祀大禹、伍大夫、屈大夫、西楚霸王、鲁公输子,闽俗称‘水神’。乾隆三十年里人,捐一千五百金重修”,又有“内水仙宫,在菜妈街后,背城面海。端午节龙舟必先至此,演剧鼓棹,名曰‘请水’”(周凯,2021:67-69)。这些记载清晰呈现了厦门地区端午龙舟竞渡前必至水仙宫举行“请水”仪式的定制化民俗实践,凸显了该仪式与水神祭祀活动的结构性耦合。关于水仙尊王信仰的起源与功能,郑振满的研究指出,在九龙江下游的漳州、厦门等区域,水仙尊王崇拜最初可能肇始于水上族群超度溺亡者亡灵的禳灾仪式,其后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与端午龙舟竞渡习俗相融合,最终演化重构为以屈原等历史英灵为核心祭祀对象的水神崇拜体系(郑振满,2012:45-81)。这一阐释为理

解闽南端午龙舟竞渡的宗教意涵及其与水仙信仰的共生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民间信仰的传播轨迹亦可见于长崎一地。在长崎著名的唐三寺中,唯有由漳泉商帮主导兴建的福济寺,其青莲殿内供奉水仙王,此例亦或可视为长崎端午龙舟竞渡习俗受到漳泉地区风俗濡染的关键性物质文化佐证。

2.2 水神信仰的共同特质

水神信仰是一种根植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自然崇拜,它与农耕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联系,对古代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永平,2006)。夏季是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充足且适时的降水是保障农业丰收的重要环境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被视为司水之神,其职能与水文气象密切相关。先民认为龙的神性力量能够调控降雨,丰沛的降水有利于作物生长,反之则可能导致旱情,极端情况下甚至引发洪涝灾害。基于此,龙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赋予了水神、雨神乃至农业保护神的文化意涵。因此,于每年仲夏之始,举行各类祭祀仪式以敬祀水神,祈求时和岁稔,是为农耕社会重要的岁时祭仪。端午节作为重要的传统节日,其相关仪式活动,尤其是竞渡习俗,与水神祭祀和龙崇拜存在着深刻的文化渊源。因此,中国的龙舟竞渡并非简单的体育竞技活动,而是古代水神祭祀和龙崇拜在民俗文化中的深刻体现。关于龙舟竞渡与水神祭祀、龙崇拜关系的详细论述可见(潘年英,1992:19-22;姚正曙、何根海,2000:36-38;徐永峰、张丽,2010:92-96;王若光、刘旻航,2013:50-55)。

长崎作为江户时期日本唯一合法的对外港口城市,水神崇拜在长崎地方社会的信仰体系中占据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长崎镇地第一社諏访神社所祀主神“建御明方神”即是日本神道教中以龙蛇为象征的水神。另有水神社奉祀“八大龙王水德尊神”,还有庇佑航海安全的神崎船魂社亦与在崎唐人渊源深厚。这些神社长期接受唐人捐银布施,反映出该地区水神信仰传统深厚且与唐人社群之间存在持续而密切的文化。这种基于共同信仰的跨文化交流,为源自中国的划龙船习俗提供了天然的接受语境与文化积淀,导致划龙船习俗与当地水神崇拜深度融合。其具体本土化过程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其一,仪式的空间转移与功能调适。据《长崎岁时记》载:五月五日划龙船“旧例自港内溯流至材木町桥下,后因有倾覆之患,奉行所严禁之。今改称‘渔猎祭’,于崎中一里外肥前领神岛、小仓等处行之”(野口文龍,1971:783)。这一空间位移与名称变更,深刻反映了该活动从单纯的唐人节庆向融入本地生产生活的仪式性祭礼的转化,是其在地化的重要标志。其二,信仰内核的融合与强化。长崎周边地区的实践进一步印证了水神信仰的核心驱动作用。小松原涛(黑岩义嗣之笔名)记载的明治三年天草富冈祈雨竞渡,明确将划龙船与龙神信仰结合。船只搭载神官僧侣,前往被认为龙神栖息的特定海域,诵读祈雨经文并供奉神饌(小松原涛,1956:51-52)。须加注意的是,竞渡本身成为祈求龙神降雨这一神圣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彰显了其从娱乐竞渡向神圣仪礼的功能转变。

由此可证,长崎地区的龙舟竞渡绝非孤立的地方性民俗活动,而是深度嵌合于本土水神崇拜的复杂宗教仪式体系之中,其仪式结构与核心功能展现出了高度的系统性与神圣性。这种将水上竞渡行为整合为水神祭祀核心环节的文化模式,与福建等地划龙船同水仙王信仰紧密结合的现象,形成了跨越地域的、具有共同学术范式意义的宗教文化特质。正是这种深植于信仰体系的内在驱动力,以及其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实现的在地化调适,共同构成了长崎划龙船习俗得以传承不辍、生生不息的关键文化逻辑。

3 长崎划龙船习俗的传承嬗变

源自中国端午节的划龙船习俗,在长崎这片独特的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后,并未停滞于初始形态,而是历经了持续而深刻的本土化再造与功能转换,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其传承轨迹并非简单的线性延续,而是充满创造性转化与多维度嬗变的动态过程。

3.1 长崎唐人演化乡土习俗

源自中国端午节的划龙船习俗,随唐人东渡传入长崎,并在江户时代的特定社会文化土壤中,经历了深刻的在地化演变。唐通事教材《唐话长短拾话》中载有一则珍贵史料,为我们生动呈现了十八世纪长崎划龙船活动的具体形态及其与“唐山”原型的显著差异,清晰勾勒出一条从文化移植到本土重构的嬗变轨迹:

再过几天,端午的大节日,这两年划龙船,不比得前年十分齐整,船头船尾都搽了红朱,又做了各样奇禽怪兽放在船当中,各船上竖一条红纱做的旗竿,各人穿了花丽衣服,也有妆做女人家的打扮的,也有披挂了假盔甲,手里轮长刀,妆做武夫的模样,也有的搽黑了脸,搽红了头发,蓬头乱发,一只手拿一个烟筒,一只手拿一个酒瓶,学做红毛总管的模样。各船卖弄奢华,悬红结彩,做长做短,妆点了划龙船,凭你费了多少银子,也不惜费,着实齐整得紧。我且问你一句话,别岛也有这个划龙船么?听见说别处地方没有这事,单单本地一个所在。划龙船为何呢?原来这一椿事情,唐山的故事,不是日本做起的。长崎这几十户人家,一半是唐种,先祖都是唐山人,所以不但是这一件做事,还是四时八节的人情礼貌,都学唐山的规矩。

(《唐话长短拾话》,2015:450-451)

上述史料虽明确记载划龙船“原是唐山的故事”,然其在长崎的实践形态已发生显著嬗变,较之原乡习俗更具“狂欢精神”。所谓狂欢精神,是指群众性文化活动中表现出的突破一般社会规范的非理性精神,它一般体现在传统的节日或其他庆典活动中,常常表现为纵欲的、粗放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赵世瑜,2017:98)。史料所述“卖弄奢华,悬红结彩,做长做短,妆点了划龙船,凭你费了多少银子,也不惜费,着实齐整得紧”,生动印证了在崎华商将之视为炫耀财力、竞逐排场的盛大狂欢。其仪式原初的祭祀与纪念意涵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追求视觉奇观与社区娱乐的强烈动机,整体氛围更趋近于华丽喧腾的日式祭典。

其次,长崎唐人划龙船在视觉元素与表演形式上呈现出夸张化与在地化特征。如载“做了各样奇禽怪兽放在船当中”及“悬红结彩,做长做短”,其繁复堆砌远超中国龙舟“十分齐整”的素朴风格,转而契合日本祭典中争奇斗艳的审美偏好。人物装扮尤显多元杂糅与戏剧化,既有“穿了花丽衣服”“妆做女人家的打扮”的性别反串,亦有“披挂了假盔甲,手里轮长刀,妆做武夫的模样”的造型。而最具长崎在地特色者,当属“搽黑了脸,搽红了头发,蓬头乱发,一只手拿一个烟筒,一只手拿一个酒瓶,学做红毛总管的模样”,此对出岛荷兰商人的夸张戏仿,更是长崎作为国际商埠特有之文化现象,即所谓的“和兰(和蘭)”形态。这种将异质元素直接植入中国节庆框架,形成标志性且独一无二的表演形态,深刻彰显了划龙船在长崎的本土化再造与创新。

再者,划龙船的社会功能与地方认同意涵被结构性重构。中国龙舟竞渡多与宗族、村落共同体意识紧密联结。而在长崎,划龙船则演变为唐人及混血后裔形塑并展演其独特社群身份与在地认同的核心载体。史料所载参与者对“别岛也有这个划龙船么?听见说别处地方没有这事,单单本地一个所在”的明确认知,确证此习俗已成为长崎独树一帜的文化标签。它既是维系“唐山”文化记忆的纽带,更是唐人社群落地生根后,融合本土及异域元素,创生专属于长崎的地方性节庆,用以强化社群凝聚力、彰显文化存在并确立其在地文化身份。

3.2 长崎市民传承龙舟竞渡

在长崎,除海上竞渡的龙舟外,另有一种曾盛行于儿童、少年群体间的“陆龙船”,即在陆地进行竞速活动。据《长崎名胜图绘》载曰:

陆龙船者,四月下旬之戏也。町中童子,效仿端午竞渡之事。取径四五寸之竹,截二丈许为船身。船首有木茶筌、蓼茶筌之属,各随所好制之。童子尽面涂丹色,首插置纸,状若神荼郁垒,分列竹船左右。红棉为帜,彩笺为旗,大书“某町童子众”,临风招展。又有戴雀笠者统率群童。舟之进退以钲锣节之,众童

齐呼“欲较技者速来”，呼啸过市。他町童子见之，则群聚喧哗，约以竞渡。双方各执纸旗列阵，择年齿相若、足力矫健者二人，齐足而立，分寸不差。复鸣钲鼓以壮声势。先抵预定之界者胜，此乃摹竞渡以迅速决胜负之法也。胜者夺其旌，更征他町，往复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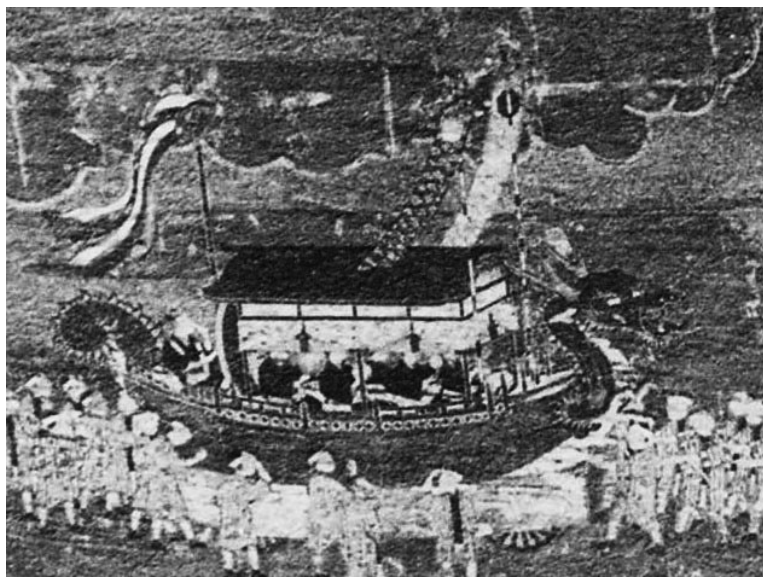
（長崎史談会，1931：485）

由此可见，长崎孩童们观摹成人海上龙舟仪式后，遂以竹为舟仿制龙船模型，和着大鼓铜锣之节拍，于街市之中沿固定路线争先竞速，此即陆龙船之形态。这标志着划龙船习俗甚至深入长崎社区儿童群体，成为其扎根日本市井社会的显著表征。此外，这种“陆龙船”的实践，也可视为长崎划龙船漫长嬗变历程中的关键过渡形态，承启了早期唐人祭祀性竞渡、江户中后期屡禁不绝的水神祭，乃至现代转型的标准化体育赛事——长崎龙舟锦标赛（長崎ペーロン選手権大会）。

长崎龙舟锦标赛始于1977年，竞赛用标准龙舟定型为长约13.6米的弓形结构，参赛人员统一为30人，含最多26名桨手，及太鼓手、铜锣手、舵手、旗手指令员各1名。赛事每年于7月末或8月初的周末在长崎港举行，参赛队伍涵盖传统社区代表队、学校及企业团体，通过区域选拔角逐锦标（高津勝，2003：39-41）。近年来，长崎队伍常与兵库县相生市等地开展竞技交流。赛事期间，各队应援团挥舞大渔旗及队旗，辅以呐喊助威。主办方亦提供免费观光船，供观众近距离观赛，强化了赛事的公共性与文化展演属性。

3.3 神道祭祀融入龙船元素

长崎宫日节（「くんち」）系諏访神社秋日大祭，为长崎市内规模最宏大的宗教民俗盛典。据传肇始于宽永十一年（1634年），时有两名艺妓于神前献演“小舞”，后获长崎奉行官署扶持而日渐隆盛，并融汇多元异国文化元素而传承至今。宫日节中的奉纳祭舞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于每年10月7日起在諏访神社秋季大祭中举行三日，已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祭仪中，当年负责奉纳舞展演的轮值町区称为“演舞町”。现今长崎市内59个演舞町分属7大组别，实行七年轮值制。各町拥有特色演目，西滨町所供奉的演舞为龙船。相传西滨町龙船的起源或与安南阿妮蓉（「アニオー」）公主下嫁长崎商人荒木宗太郎之史事有关，龙船殆为王室舟輿之再现。长崎宫日节中献演龙船的起始年代虽无确证，然据諏访神社回廊所悬1886年北海五荣所画绘马推考（见图2），至迟于明治时期諏访秋祭仪式中便已出现龙船。



资料来源：北海五荣『龍船繪馬』（長崎くんちData 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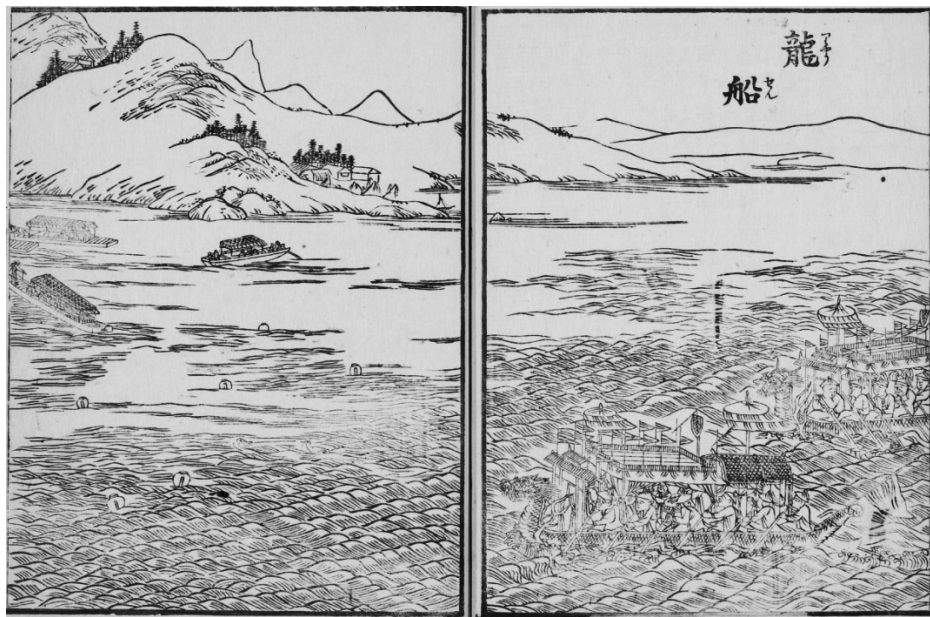
图2 1886年北海五荣所画龙船绘马

西滨町龙船的形制结构严整,尤以中央的朱漆双层楼阁为显著特征,其装饰工艺精致华丽,体现了高度的审美价值和技艺水平。事实上,从长崎西滨町龙船的形制来看,其与《清俗纪闻》中所载的竞渡“龙船”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与同构性:

朔日至六日,于有江湖之处浮放数艘龙船,举行竞渡。龙船长约五六间,宽约二间,船首船尾为龙头龙尾形状,船身画满龙鳞,均涂彩色,呈龙浮于水上之状。船只前部有牌楼,称为龙门。上竖凉伞,四根柱上插有旗帜。后有两层之台,台之中央竖立凉伞,四方竖列旗帜数杆。台后有亭,亭上有凉伞。亭之两侧建有栏杆,上面竖列数杆旗帜。船后斜插大旗一杆于龙尾之上,成为有种种装饰之船只。旗及凉伞均用星星红、明亮缎子、绉绸等缝制,极为美丽。

(中川忠英,2006:33)

通过对二者形制的细致比对(见图3、图4),不难发现长崎諏访秋祭中的龙船形制虽无法被确证为直接源自中国端午竞渡之龙船,但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显而易见。不仅如此,龙船演舞时挽夫皆着唐装,船上所演唐子舞的服饰亦保留浓厚的唐风余韵,而仪式中反复出现的“逐福(「ヤーホ」)”之呼号,即闽南语“迎福”之意也。凡此种种迹象,均有力地表明长崎宫日节中的龙船演舞与中国传统龙舟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厚且紧密的文化关联。



资料来源:中川忠英《清俗紀聞》(中華書局,2006)。

图3 《清俗纪闻》所载“龙船”

4 结 语

长崎划龙船习俗是东亚文化交流进程中,文化传统通过在地化调适与创造性转化实现延续与再生的典型个案。本文通过对历史脉络、地域渊源及功能嬗变的系统考察,可以得出以下核心结论:其一,长崎划龙船习俗具有明确的地域文化谱系。结合闽南语“划龙船”与“爬龙船”的语音考证、长崎龙船与《清俗纪闻》中福建竞渡船的高度形制趋同,以及福济寺水仙尊王信仰的佐证,可将长崎划龙船的文化渊源追溯至明清时



图4 长崎西滨町龙船(2023年8月9日笔者摄影)

期福建地区的端午竞渡传统。区别于以往研究中笼统的“中国影响”叙事,凸显了地域性要素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的关键作用;其二,“锁国”体制下的长崎是文化适应性重构的特殊场域。划龙船并非简单移植,而是经历了从侨民节庆向地方民俗的结构性转换:其功能从最初的社群认同表达,逐步融入带有狂欢性的地方展演,进而与渔猎祭仪、祈雨信仰相结合,最终转型为现代体育赛事,并融入长崎宫日节等神道祭祀体系。

综上所述,长崎划龙船所呈现的“特定地域文化→特殊政治场域→功能适应性转化”的模式,具有普遍的文化史意义。这一模式不仅见于长崎宫日节中的唐船、舞龙等演物,亦贯穿于妈祖信仰、禅宗实践等东传日本的文化事项之中。可以说,在政治变动与文化交错并存的东亚交流史上,文化传统正是凭借其结构弹性与功能可塑性,才能跨越地域与时代界限,逐步内化为地方社会的文化符号,从而持续其动态存续的生命力。

注释

[1] 经检阅长崎地方古籍文献可知,「ペーロン」一词在日本语境中多以“扒龙”“爬龙”“竞渡船”汉字来表记。在江户时期的地方志《长崎名胜图绘》、以及唐话教材《唐话长短拾话》中,明确将此项源于长崎华人的传统习俗称为“划龙船”。鉴于此,本文以“划龙船”作为「ペーロン」的现代汉语译名。

参考文献

- 王永平.论唐代的水神崇拜[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王若光,刘旻航.“飞龙在天”:端午龙舟竞渡习俗考源[J].民俗研究,2013(6).
 中川忠英.清俗紀聞[M].方克,孙玄龄,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邢雪艳.端午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流变[J].民间文化论坛,2023(6).
 孙凯,刘云.明郑海商集团对日贸易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6(1).
 舍人亲王.日本书纪[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周凯.厦门志[M].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厦门:鹭江出版社,2021.
 郑振满.民间信仰与祀典制度:清代台湾的水仙尊王崇拜[M]//成功大学历史系,编.海洋古都:府城文明之形塑学术论文集.新北:稻乡出版社,2012.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赵乐牲,译.万叶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姚正曙,何根海.龙舟竞渡的起源探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0(6).
 徐永峰,张丽.龙舟竞渡的文化源流及其现代演变[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 爱德华·莫德·汤普森,编.查理·考克斯日记与通信(1615-1622)[M]//周宁,鲁西奇,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精要外文文献汇刊:第二辑·英文文献第十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
- 唐话长短拾话[M]//王振忠.袖中东海一编开:域外文献与清代社会史研究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 梁兆阳.崇祯海澄县志[M].中共龙海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整理.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19.
- 谢肇淛.五杂俎[M].韩梅、韩锡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1.
- 潘年英.赛龙舟习俗的原始意义考[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2).
- 二階堂善弘.長崎唐寺の媽祖堂と祭神について——沿海「周縁」地域における信仰の伝播[J].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09(2).
- 大日方克己.古代国家と年中行事[M].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
- 小松原涛.天草ペーロン志[M].長崎:天草民報社,1956.
- 日本紀略[M]//經濟雜誌社,編.国史大系:第5卷.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
- 田邊茂啓.長崎志正編[M].古賀十二郎,校訂.長崎:長崎文庫刊行会,1928.
- 長崎史談会,編纂.長崎名勝圖繪[M].長崎:長崎史談会,1931.
- 長崎市役所.長崎市史:風俗編[M].長崎:長崎市役所,1925.
- 松浦章.清代帆船の船内祭祀:沿海地域における宗教伝播の過程において[J].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09(2).
- 松浦静山.甲子夜話:第一[M].東京:国書刊行会,1910.
-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唐通事會所日録(七)[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
- 宝暦元年唐国福建省江孜漂着候奥州南部之者六人口書[M].写本.長崎:長崎奉行所,1751.
- 神宮司序,編.古事類苑:第48冊[M].京都:古事類苑刊行会,1908.
- 高津勝.「和船競漕」考:社会史的アプローチ[J].一橋大学スポーツ研究,2003(22).
- 黒岩義嗣.ペーロン考[M].未刊.長崎県立図書館郷土室所蔵,1940.
- 野口文龍.長崎歳時記[M]//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第十五卷・都市風俗.東京:三一書房,1971.
- 越中哲也,注解.長崎古今集覧名勝図絵[M].長崎:長崎文献社,1976.
- 勝峰晋風,編.閩秀俳家全集[M].東京:聚英閣,1922.
- 榊原浩晃.長崎におけるペーロン:近代における伝統スポーツとしての船競漕(船競渡)[J].体育史研究,2012(29).
- 源高明.西宮記[M]//近藤瓶城,編.史籍集覧(編外).東京:近藤出版部,1932.
- 廣川獬.長崎聞見録[M].刻本.京都:京都書林,1800.
- 熊野晃三.長崎ペーロン競漕の変容:港内ペーロンの担い手の推移を中心として[J].純心人文研究,2004(10).
- 瀬戸口照夫.「伝承競技」としての「競漕」の研究:ハーリーとペーロンを中心として[J].鹿児島県立短期大学研究年報,1981(9).

From Chinese Origins to Local Evolution: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Nagasaki's Péron Dragon Boat Tradition

SUN Kai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the dragon boat custom in Nagasaki, Japan. The study highlights that this tradition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hinese Dragon Boat Festival, particularly influenced by the dragon boat racing traditions and water deity beliefs of Fujian region. It was introduced to Nagasaki during the Edo period via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Fujian. Within Nagasaki's unique context as a cultural crossroads in East Asia, the dragon boat custom underwent profound localization. It transitioned from an initial practic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to a folk ritual combining sacred ceremonies and public entertainment, eventually integrating into Shinto rituals and modern sporting event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dragon boat custom in Nagasaki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case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d continuous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 culture within East Asian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Keywords: Nagasaki; Dragon Boat Festival;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责任编辑:王晨萌)